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

——贸易比较偏好视角

丁晓强¹ 张少军¹ 李善同²



(1.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北京 100010)

内容提要:中国目前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入认识其参与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 有助于加快建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 本文构建了省际调出与出口比较偏好指数, 利用中国七年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投入产出表, 考察了 1987—2017 年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 主要发现有: 在全国层面, 各省份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 以 2007 年为“拐点”, 国内经济循环导向总体减弱, 国际经济循环导向总体增强; 沿海地区的经济循环导向在 2017 年之前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 而内陆地区的经济循环导向始终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 反映了中国梯度式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 各省份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绝对差异不断扩大, 反映了各省份在分工体系中的职能存在明显差异; 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 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 反映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存在部门差异; 工业各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绝对差异逐渐扩大, 反映了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分工程度不断深化。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国内经济大循环 国际经济大循环 贸易比较偏好 核密度估计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1)02—0023—15

一、引言

后发国家和地区如何摆脱贫弱, 实现对先发国家和地区的追赶与超越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国际经验表明, 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合适的赶超战略可以缩短经济赶超的进程。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 20 世纪中前期拉美国家利用进口替代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实现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20 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则凭借出口导向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实现了经济赶超。总体而言, 进口替代的国内大循环战略对贸易和工业的奖励制度具有明显的偏向性, 即重视内销的生产而轻视出口的生产; 而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尽管在本质上既不歧视内销的生产与供出口的生产, 也不歧视购买本国商品与外国商品, 但

收稿日期: 2020 - 09 - 24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省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寻找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动能”(718731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贸易的本地偏好之谜: 中国悖论、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17YJA79009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内区域分工与市场一体化研究”(71733003)。

作者简介: 丁晓强,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是省际贸易, 电子邮箱: xqding1990@163.com; 张少军,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是省际贸易、全球价值链, 电子邮箱: 54foxzhang@163.com; 李善同, 女,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是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和 CGE 模型, 电子邮箱: shantong@dre.org.cn。通讯作者: 张少军。

却更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银行,1987)^[1]。因此,通过分析一国或地区贸易在地理方向上的比较偏好特征(即在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权衡)^①,可以精准判断该国或地区参与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进而为其赶超战略和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中国主要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不仅推动了经济的总体增长,而且帮助中国构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至今,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依托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实现了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从而成为经济赶超最成功的国家之一(Lin和Wang,2020)^[3]。

随着全球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比较优势显著下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出口贸易的增长空间被压缩,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弱化(刘伟和蔡志洲,2019)^[4],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中国过去依靠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经济赶超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主要发达国家的赶超经验已经表明,依托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才是实现经济赶超的终极手段(朱廷珺和林薛栋,2014)^[5],且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会涵养出口比较优势(Krugman,1980^[6];Costinot等,2019^[7]),进而推动国际经济循环体系的提升与优化。因此,中国要想最终实现经济赶超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依托自身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并以此来带动和优化国际经济循环体系,从而建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从贸易比较偏好视角出发,深刻认识中国经济赶超进程中参与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则是建设“以内为主,内外互促”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必要前提。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贸易偏好特征进行了广泛探讨。Poncet(2003)^[8]、行伟波和李善同(2009)^[9]等基于边界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均发现,中国各省份间的贸易存在本地偏好;而张少军(2013)^[10]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却表明,中国存在着贸易的本地偏好悖论。张少军(2013)^[2]较早地提出了贸易比较偏好概念,并基于中国五年30个省份的省内贸易、省际贸易和国际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和工业各部门对国内贸易(省内贸易和省际贸易)的比较偏好程度小于对国际贸易的比较偏好程度。Hayakawa(2017)^[11]利用中日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贸易数据,结合引力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贸易的本地偏好,结果显示,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间的贸易以及中国与日本间的贸易均存在着本地偏好。上述研究为理解中国的贸易偏好特征提供了经验证据,但却未能诠释中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基本规律,具体地:其一,基于边界效应模型和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而且也不能反映中国贸易偏好在省份和部门层面上的个体差异。由于中国内部不同省份之间以及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异,导致各级政府并没有在一个统一的步调下实行工业化策略(乔万尼·阿里吉等,2006)^[12]②。因此,相关研究对中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现实指导意义明显不足。其二,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本质是通过出口的持续增长来带动经济(彭小兵和韦冬萍,2020)^[14],在省份层面上,省际调出与出口是相互替代关系,因而两者之间的权衡可以透视出一省参与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尽管张少军(2013)^[2]测度并分析了中国的贸易比较偏好,但未关注贸易方向这一属性,因而未能揭示中国各省份和工业各部门在省际调出与出口之间的权衡,相应地,也就无法准确回答中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

① 在经济地理中,存在着贸易的本地偏好与比较偏好,其体现的是一国居民和企业在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权衡。其中,贸易的本地偏好是一个绝对量概念,反映的是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在总量上的差异;而贸易的比较偏好是一个相对量概念,反映的是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在倍数、增速和比值等方面的差异(张少军,2013)^[2]。

② 中国是典型的大国经济体,各省份的比较优势存在显著差异,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Jin等,2005)^[13],这就使得各省份有能力自主选择赶超战略。

问题。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分别从省份视角和部门视角构建了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和出口比较偏好指数,并利用中国七年(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30个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探究了中国各省份和工业各部门的贸易比较偏好特征,并以此为标准定量识别了中国经济赶超进程中各省份和工业各部门参与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

本文可能的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既有研究缺乏对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有效度量,本文借鉴张少军(2013)^[2]提出的贸易比较偏好概念,在进一步区分贸易方向的基础上,构造了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测度指标——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和出口比较偏好指数,丰富了现有的度量指标。第二,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的一般规律,有助于对中国经济赶超的基本规律予以精准判断,并为建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依据。第三,利用数据优势,从省份和部门两个维度挖掘了中国参与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在不同省份(沿海和内地)以及不同部门(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呈现出中国经济循环的结构性特征。

二、指标构造、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 指标构造

本文借鉴张少军(2013)^[2]构造的贸易比较偏好指数,在进一步区分贸易方向的基础上,构造了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与出口比较偏好指数,以此来评估中国各省份及工业各部门在省际调出与出口之间的权衡,进而定量识别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相关指数的构建方法具体如下:

(1)在省份视角下,贸易比较偏好指数可以定义为:(i 省份某种贸易的总额/ i 省份两种贸易的总额)/(全国某种贸易的总额/全国两种贸易的总额)。因此, i 省份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CBP_{i,-i}$)与出口比较偏好指数($CBP_{i,f}$)的测度公式可以表示为:

$$CBP_{i,-i} = \frac{\sum_{k=1}^s x_{i,-i}^k / (\sum_{k=1}^s x_{i,-i}^k + \sum_{k=1}^s x_{i,f}^k)}{\sum_{i=1}^n \sum_{k=1}^s x_{i,-i}^k / (\sum_{i=1}^n \sum_{k=1}^s x_{i,-i}^k + \sum_{i=1}^n \sum_{k=1}^s x_{i,f}^k)} \quad (1)$$

$$CBP_{i,f} = \frac{\sum_{k=1}^s x_{i,f}^k / (\sum_{k=1}^s x_{i,-i}^k + \sum_{k=1}^s x_{i,f}^k)}{\sum_{i=1}^n \sum_{k=1}^s x_{i,f}^k / (\sum_{i=1}^n \sum_{k=1}^s x_{i,-i}^k + \sum_{i=1}^n \sum_{k=1}^s x_{i,f}^k)} \quad (2)$$

(2)在部门视角下,贸易比较偏好指数可以定义为:(k 部门某种贸易的总额/ k 部门两种贸易的总额)/(全国某种贸易的总额/全国两种贸易的总额)。因此, k 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CBI_{-i}^k)与出口比较偏好指数(CBI_f^k)的测度公式可以表示为:

$$CBI_{-i}^k = \frac{\sum_{i=1}^n x_{i,-i}^k / (\sum_{i=1}^n x_{i,-i}^k + \sum_{i=1}^n x_{i,f}^k)}{\sum_{k=1}^s \sum_{i=1}^n x_{i,-i}^k / (\sum_{k=1}^s \sum_{i=1}^n x_{i,-i}^k + \sum_{k=1}^s \sum_{i=1}^n x_{i,f}^k)} \quad (3)$$

$$CBI_f^k = \frac{\sum_{i=1}^n x_{i,f}^k / (\sum_{i=1}^n x_{i,-i}^k + \sum_{i=1}^n x_{i,f}^k)}{\sum_{k=1}^s \sum_{i=1}^n x_{i,f}^k / (\sum_{k=1}^s \sum_{i=1}^n x_{i,-i}^k + \sum_{k=1}^s \sum_{i=1}^n x_{i,f}^k)} \quad (4)$$

其中, $i=1,2,\dots,n$ 代表具体省份, $k=1,2,\dots,s$ 代表产品部门; $x_{i,-i}^k$ 表示 i 省份 k 部门的省际调出总额, $x_{i,f}^k$ 表示 i 省份 k 部门的出口总额。

需要说明的是,从两种贸易比较偏好指数的构建形式来看,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与出口比较偏好指数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两者中的任意一个大于1,则另一个必然小于1。因

此,本文主要利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来分析中国各省份及工业各部门对省际调出与出口的比较偏好差异,进而识别其参与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①。具体来讲,如果 i 省份或 k 部门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大于 1,表明其具有明显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即其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大于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反映出该省份或该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是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如果 i 省份或 k 部门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小于 1,表明其具有明显的出口比较偏好——即其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小于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反映出该省份或该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是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

2. 研究方法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是一种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方法,可以借助概率分布图直观地反映变量的分布位置、分布形态以及延展性等信息。该方法假设随机变量 Z 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f(z)$,因此可以利用已知的样本观测值来估计任意点 z 的概率密度函数,即:

$$\hat{f}(z) = \frac{1}{mh} \sum_{a=1}^m K\left(\frac{z_a - \bar{z}}{h}\right) \quad (5)$$

其中, m 为观测值个数, z_a 为样本观测值, \bar{z} 为样本均值, h 为带宽, $K(\cdot)$ 为核函数,它是一种平滑函数或者加权函数,主要包括高斯(Gaussian)核函数、三角核(Triangular)核函数、均匀(Uniform)核函数和 Epanechnikov 核函数等形式。一般而言,核函数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begin{cases} \lim_{z \rightarrow \infty} K(z) \cdot z = 0 \\ K(z) \geq 0, \int_{-\infty}^{+\infty} K(z) dz = 1 \\ \sup K(z) < +\infty, \int_{-\infty}^{+\infty} K^2(z) dz < +\infty \end{cases} \quad (6)$$

在进行核密度估计时,需要自行选择核函数和带宽。由于核函数的选择对估计精度没有太大影响,本文选取较为常用的高斯(Gaussian)核函数。然而,带宽的选择对于估计精度至关重要,对于同一核函数,带宽越大,核密度估计的曲线越平滑,估计偏差越大;反之,带宽越小,核密度估计的曲线越不平滑,估计偏差越小;带宽的最优选择应该遵循均方误差最小原则(Silverman, 1986)^[15]。本文利用“Silverman 拇指准则”确定带宽,即 $h = 0.9 n^{-1/5} \times \min\{\sigma, (Q_{3/4} - Q_{1/4})/1.349\}$,其中 σ 为样本标准差, $(Q_{3/4} - Q_{1/4})$ 为样本上四分位数与下四分位数的差。

利用核密度分布图可以直观呈现中国各省份及工业各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分布位置、分布态势、演进趋势以及个体差异等特征。具体而言,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分布向左(右)移动,表明各省份或工业各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整体降低(提高),体现了各省份或工业各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整体下降(上升);波峰分布越来越扁平(陡峭),表明各省份或工业各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的个体差异在扩大(缩小),体现了各省份或工业各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的绝对差异在扩大(缩小);波峰数量越来越多(少),表明各省份或工业各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出现两极或多极化(收敛)现象,体现了异质性群体的存在导致各省份或工业各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增大(减小)。

3.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省际调出数据和出口数据来自各省份统计局历年编制的投入产出表以及李善同等(2010^[16];2018^[17])编制的中国地区扩展投入产出表,包括 1987 年、1992 年、1997 年、2002 年、2007

^① 受篇幅限制,出口比较偏好指数的结果备索。

年、2012年和2017年共七个年份。中国的省级投入产出表从行模型来看存在如下的关系:中间使用合计+最终使用合计(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出口+省际调出)-进口-省际调入=总产出。这里,省际调出与出口即是本文所采用的贸易数据。比较七年30个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本文发现,有的省份在编制投入产出表的过程中区分了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本文将此种表称为四列表(即包括出口、省际调出、进口和省际调入四列);有的省份在编制投入产出表的过程中没有区分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而是将出口和省际调出合并为调出,进口和省际调入合并为调入,本文将此种表称为两列表(即包括调出和调入两列);有的省份在编制投入产出表的过程中则只报告了净调出(即调出-调入),本文将此种表称为单列表。对于四列表,可以直接采用其省际调出与出口的数据;对于两列表,本文借鉴 Poncet(2003)^[8]的处理方法,采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与国研网数据库提供的各省份进出口数据,对投入产出表中的调出和调入两列进行拆分,获得相应的省际调出与出口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库的各省份进出口数据分类属于海关HS制度,本文将海关HS制度的分类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进行了对照合并^①。对于单列表,由于不能依据进出口数据来推算,则不能获得省际贸易的数据。原属广东省的海南行政区在1988年升格为海南省,原属四川省的重庆行政区在1997年升格为重庆直辖市,青海省没有编制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1992年的安徽省与黑龙江省的投入产出表属于单列表,西藏自治区因为数据不全未被纳入本研究,本文最终使用的198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共有27张(去除海南、重庆和青海),1992年地区投入产出表共有27张(去除黑龙江、安徽和重庆),其余各年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分别有30张。

本文采用的1987年和1992年的各省份投入产出表为33部门,1997年的各省份投入产出表为102部门,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的各省份投入产出表为42部门。为了统一口径,本文将历年投入产出表的产品部门分类进行了对照合并,合并后的29个产品部门具体为:农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及烟草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品、木材及家具业、造纸及文教业、石油加工炼焦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冶炼压延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业、电气机械器材业、电子及通信设备业、仪器及文化机械业、其他制造业、电气水业、建筑业、运输邮政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及社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生科研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三、中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地区特征

1. 中国各省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典型事实

图1呈现了基于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中国各省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及其演变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在1987—2017年各省份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始终大于1,且在总体上升的态势下,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变化。具体表现为,1987—1992年各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轻微下降;1992—2007年各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平稳上升;2007—2012年各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快速下降;2012—2017年各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缓慢上升。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大于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但2007年之后各省份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总体上升;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循环导向在整体上是以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但以2007年为“拐点”,国内经济循环导向总体减弱。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之后,各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下降主要是由内陆

① 受篇幅限制,相关过程备索,下同。

省份造成的^①。其中的原因可能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沿海与内陆地区分工地位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国的沿海省份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了加工组装的分工环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将内陆省份压制在原材料和矿产品等初级成本供应商的地位(张少军和刘志彪,2013)^[18],因此,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沿海省份出口增长的减缓会降低内陆地区省际调出的增长速度。二是区域出口贸易格局的变化。由于沿海地区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国家贸易政策的调整,使得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不断向内陆地区转移,从而导致内陆地区的出口快速增长(林桂军和黄灿,2013)^[19]。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使得2007年之后内陆省份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显著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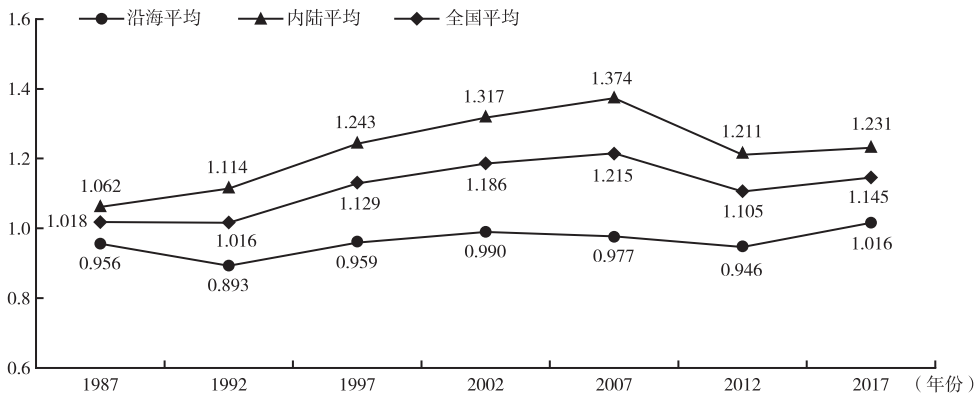


图1 1987—2017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及其演变趋势

注:纵坐标为省际调出比较偏好程度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分区域^②来看,1987—2017年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与全国各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的演变趋势大致相同。两相比较,沿海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只有自2017年开始大于1,其他年份均小于1,总体上具有较强的出口比较偏好——即其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总体上大于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而内陆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在各个年份始终大于1,具有明显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即其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始终大于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此外,以2007年为界,二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这说明,沿海地区的经济循环导向总体上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但2017年开始已经转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而内陆地区的经济循环导向始终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而且,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循环导向在2007年之后有趋同的趋势。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改革和发展的重心集中在沿海地区,使这一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并在沿海与内陆地区形成了差异巨大的发展基础和环境(蔡昉和王德文,2002)^[20],这种梯度式的开放模式使得内陆省份被迫成为沿海省份参与全球分工的原材料和矿产品等初级原料供应商,从而形成了“沿海倚重国际循环、内陆倚重国内循环”的分化格局。因此,中国在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发展策略,而是要立足各地区的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沿海地区应该进一步加强国内经济循环,而内陆地区则应该着重加强国际经济循环。

① 2007—2017年,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下降的省份有22个,其中的17个是内陆省份,五个是沿海省份。从细分时间段来看,2007—2012年,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下降的省份有24个,其中的16个是内陆省份,八个是沿海省份;2012—2017年,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下降省份有10个,其中的八个是内陆省份,两个是沿海省份。

② 本文将30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沿海和内陆两大区域,其中沿海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内陆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从具体省份来看,1987—2017年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最大的五个省份(均大于1)以内陆省份为主,其中只有北京(1987年)、河北(1992年、1997年和2007年)和海南(2017年)三个沿海省份在个别年份进入前五位;在全部七个年份中,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最大的两个省份均是内陆省份(如表1所示)。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最小的五个省份(均小于1),以沿海省份为主——只有新疆(1987年)、云南(1992年)和四川(2012年)三个内陆省份在个别年份进入后五位^①;在全部七个年份中,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最小的四个省份均是沿海省份。此外,在全部七个年份中,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大于1的内陆省份数,始终远远大于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大于1的沿海省份数;而且,几乎所有的内陆省份均具有明显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而只有一半左右的沿海省份具有省际调出比较偏好。这进一步说明,内陆省份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沿海省份则具有较强的国际经济循环导向;而且,尽管2017年沿海省份整体上具有国内经济循环导向,但仍有不少省份的经济循环导向是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

表1 1987—2017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程度的排名

省份类别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2012	2017
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最大的五个省份		河南	新疆	重庆	陕西	吉林	内蒙古	吉林
		贵州	河南	新疆	重庆	云南	青海	黑龙江
		甘肃	河北	河北	宁夏	内蒙古	宁夏	甘肃
		吉林	湖北	甘肃	吉林	陕西	云南	内蒙古
		北京	贵州	安徽	安徽	河北	湖南	海南
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最小的五个省份		新疆	云南	浙江	天津	山东	四川	江苏
		广西	浙江	北京	江苏	江苏	浙江	浙江
		山东	海南	上海	上海	上海	福建	广东
		福建	广东	福建	福建	福建	山东	福建
		广东	福建	广东	广东	广东	广东	山东
指数大于1的省份数	全国	18	20	23	23	23	23	24
	沿海	4	6	5	5	5	6	7
	内陆	14	14	18	18	18	17	17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中国各省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分布特征与动态演进

图2展示了基于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中国各省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分布动态特征。在全国层面上,各省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分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在样本考察期内,以2007年为界,各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波峰经历了先右移后左移的演变过程,总体表现为右移。这表明,2007年之前,多数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持续上升,之后则出现下降,但总体仍表现为上升态势,体现了多数省份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整体上升。第二,在样本考察期内,以2007年为界,各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波峰高度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总体表现为下降态势;波峰宽度则总体变大,且左拖尾较长。这意味着,各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体现了各省份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由于区域间发展模式的差异是各地区分工合作不断深化的现实基础(裴长洪和刘洪愧,2020)^[21],而经济循环导向是地区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因此,各省份国内经济循环导向程度

① 这三个省份可能是因为靠近边疆地区,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显的出口比较偏好。

的差异扩大,反映了其分工地位与分工职能存在明显差异。第三,在样本考察期内,各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主体是一种单峰形态,分布的左侧出现微小的“隆起”。这说明,各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出现极化趋势,体现了异质性群体的存在导致各省份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绝对差异进一步增大。应当指出,分布左侧出现的高度较低的波峰,主要是由东南沿海一带的省份造成的,表明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省份的经济循环导向率先向国际经济大循环转变——“隆起”部分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均小于1,符合中国的现实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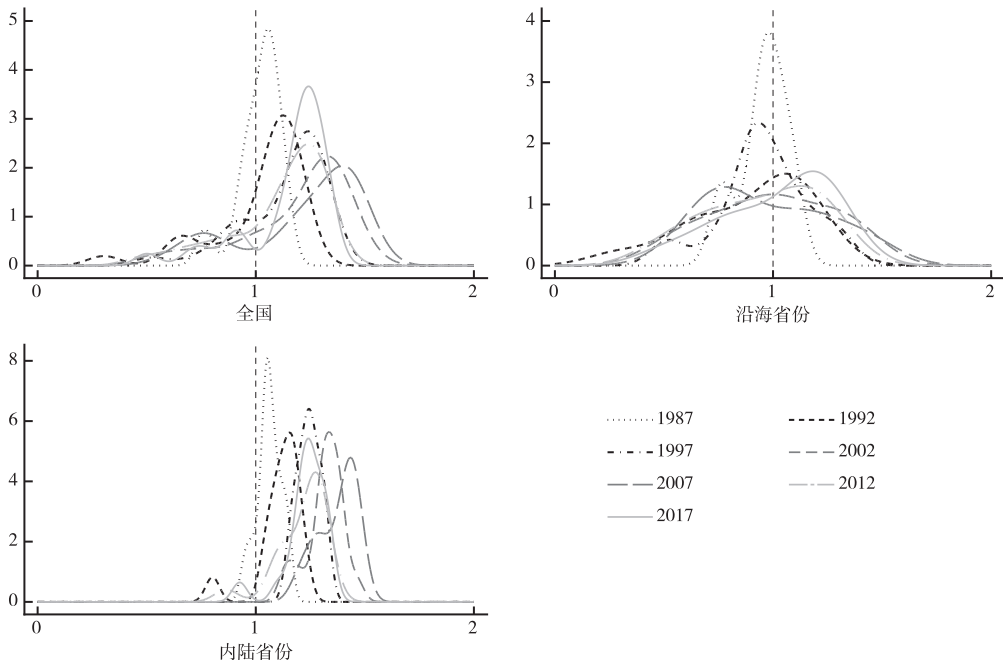


图2 1987—2017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分布动态

注:图中横轴为省际调出比较偏好程度,纵轴为概率密度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分区域层面上,1987—2017年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分布具有如下明显特征:首先,沿海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波峰在总体右移的趋势下,经历了“右移→左移→右移→左移→右移”的交替变化过程;内陆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波峰则与全国整体的变动趋势一致。这表明,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总体上升,体现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各省份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总体增强^①。其次,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波峰高度总体下降,波峰宽度总体变宽,且沿海省份的波峰宽度在各个年份始终大于内陆省份的波峰宽度。这意味着,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各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的内部绝对差异均呈现扩大趋势,体现了两大区域内部各省份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且沿海省份之间的差异程度显著大于内陆省份之间的差异程度。最后,沿海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分布在1987年和1997年均存在两个明显的波峰,其余年份则只存在一个明显的波峰;内陆省份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分布在1992年、2002年、2012年和2017年均存在两个明显的波峰,在其余年份只存在一个明显的波峰。这说明,沿海

^① 此处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经济循环导向程度的变动趋势,与基于均值的分析结果并不矛盾。均值分析揭示的是各省份经济循环导向选择的平均情况,反映了总体平均水平的变动特征;而核密度分布揭示的是中国经济循环导向选择在个体层面上的动态演进规律,反映的是个体水平的整体变动特征。

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的极化趋势最终消失,而内陆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的极化趋势总体增强,即异质性群体的存在导致内陆省份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四、中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部门特征

1. 工业部门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典型事实

图3呈现了基于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工业部门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及其演变趋势。从工业整体来看,在1987—2017年工业各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始终在1的水平上下轻微波动,但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30年间仅下降了2.3个百分点。特别地,2007年之后,工业各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持续下降,且在2012年和2017年均小于1。这表明,工业整体对省际调出与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差异较小,但2007年之后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持续增强,反映出工业整体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导向程度在增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资本密集型部门出口比较偏好大幅度上升造成的,同时也表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有所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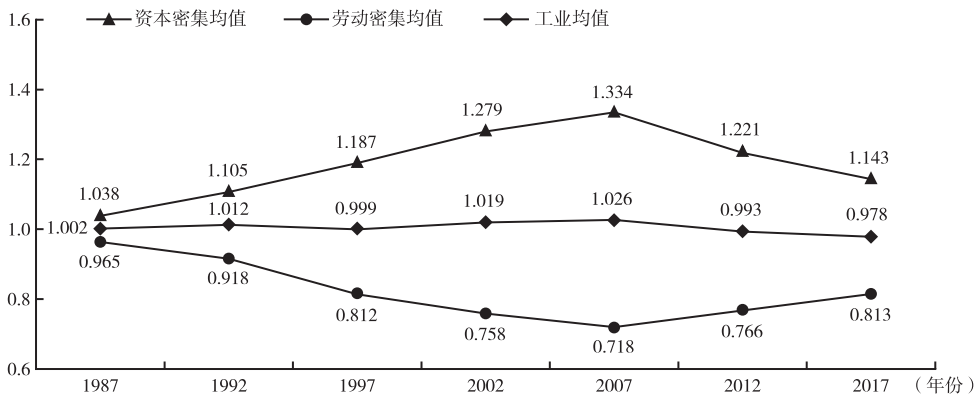


图3 1987—2017年工业部门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及其演变趋势

注:纵坐标为省际调出比较偏好程度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分部门来看^①,1987—2017年资本密集型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总体上升,相反,劳动密集型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总体下降。两者相比,资本密集型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始终大于1,具有明显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即其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大于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而劳动密集型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均值始终小于1,具有明显的出口比较偏好——即其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大于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此外,2007年之前,两者之间的差距变化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7年之后则出现收敛。这说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且两者的经济循环导向在2007年之后出现收敛趋势。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状况决定了在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出口比较优势,因而实施了出口导向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相反,大多数资本密集型部门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推行了进口替代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潘文卿和张伟,2001)^[22]。因此,未来中国工业赶超的关键举措应该是:一方面,要加强劳动

① 将20个工业部门按照要素密集度划分为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两大类,其中劳动密集型部门包括非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品、木材及家具业、造纸及文教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电气机械器材业、电子及通信设备业、仪器及文化机械业;资本密集型部门包括煤炭采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及烟草业、石油加工炼焦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冶炼压延业、交通运输设备业、电气水业。

密集型部门对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的建设,以防备落入产业“空心化”的衰退陷阱;另一方面,要强化资本密集型部门对国际经济循环体系的建设,进而培育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从具体部门来看,1987—2017年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最大的四个部门(均大于1)以资本密集型部门为主,其中的25个属于资本密集型部门,只有仪器及文化机械业(1987年和1992年)和机械工业(1987年)这两个劳动密集型部门在个别年份进入前四位;金属矿采选业始终出现在1992年之后的全部6个年份中,电气水业始终出现在1997年之后的全部5个年份中(如表2所示)。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最小的四个部门(均小于1)以劳动密集型部门为主,其中的27个属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只有石油天然气开采业这一资本密集型部门在1987年进入后四位;服装及其他纤维品始终出现在全部七个年份中,电子及通信设备业始终出现在1997年之后的全部五个年份中。此外,在全部七个年份中,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大于1的资本密集型部门数,始终大于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大于1的劳动密集型部门数——60%以上的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均大于1,而只有不超过40%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大于1。这进一步支持了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结论。

表2 1987—2017年工业各部门经济循环内外导向程度的排名

部门类型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2012	2017	
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最大的四个部门	仪器文化机械	交通运输设备	金属矿采选	金属矿采选	电气水业	油气开采	煤炭采选	
	交通运输设备	仪器文化机械	电气水业	油气开采	油气开采	金属矿采选	油气开采	
	机械工业	金属冶炼压延	煤炭采选	电气水业	金属矿采选	电气水业	电气水业	
	金属冶炼压延	金属矿采选	非金属矿物制品	煤炭采选	石油加工炼焦	煤炭采选	金属矿采选	
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最小的四个部门	油气开采	纺织业	造纸及文教	电子通信设备	纺织业	造纸及文教	造纸及文教	
	纺织业	造纸及文教	电子通信设备	仪器文化机械	电子通信设备	金属制品	纺织业	
	造纸及文教	木材及家具	仪器文化机械	纺织业	木材及家具	服装及纤维	服装及纤维	
	服装及纤维	服装及纤维	服装及纤维	服装及纤维	服装及纤维	电子通信设备	电子通信设备	
指数大于1的部门数	工业	11	14	11	11	11	11	10
	资本密集	7	10	9	10	10	10	9
	劳动密集	4	4	2	1	1	1	1

注:由于表格空间有限,表中的工业部门名称均做了简化处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工业部门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分布特征与动态演进

图4展示了基于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工业部门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分布动态特征。在整体层面上,工业部门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分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1987—2017年工业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主峰,以2007年为界,经历了先右移后左移的演变过程,总体上呈现微弱的右移趋势。这表明,2007年之前,部分工业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不断上升,之后出现小幅下降,但总体上仍表现为轻微上升趋势,体现了部分工业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有所提升。第二,在1987—2017年工业各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波峰高度,以2007年为界,先下降后上升,总体表现为下降态势;波峰宽度则先变大后缩小,总体表现为变宽态势;而且,左拖尾较长。这意味着,工业各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的绝对差异逐渐扩大,体现了工业各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在社会分工的链条上,部门间的发展差异强化了其投入产出联系,进而导致部门间生产分工与协作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工业各部门经济循环导向程度的绝对差异扩大,反映了工业部门间分工

程度的不断深化。第三,在1987—2017年工业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左侧始终存在高度不同的“隆起”,而且,1997—2012年期间,分布左侧“隆起”的高度逐渐逼近主峰高度。这说明,工业各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存在两极分化趋势,其中,分布左侧“隆起”的形成是由劳动密集型部门造成的,且这些部门的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均小于1。这种分布形态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工业发展立足国内禀赋优势,首先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建立了依托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经济赶超模式,而且进一步体现了工业各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的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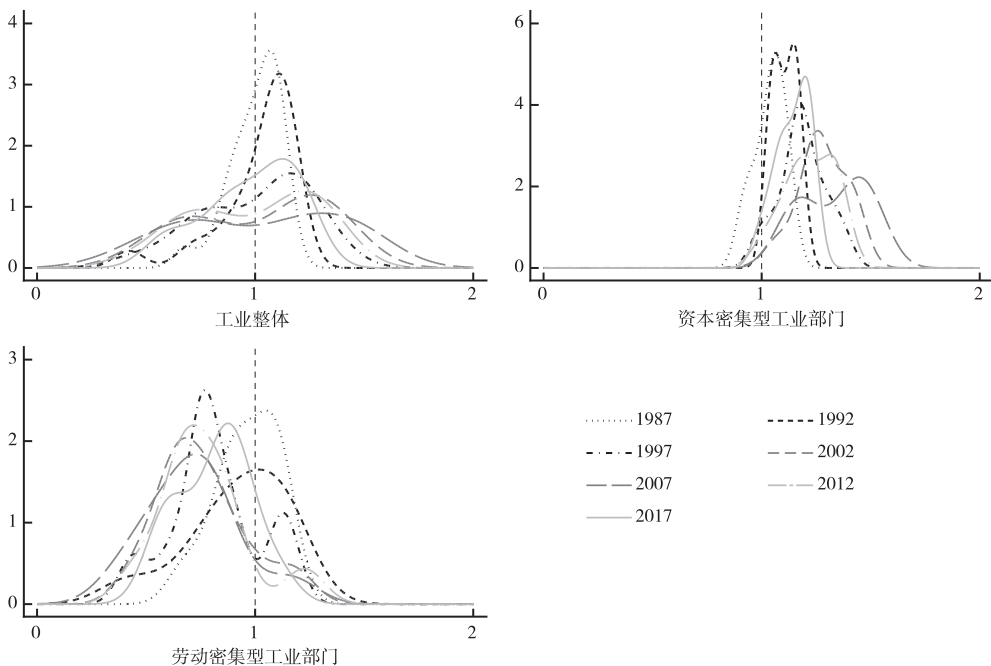


图4 1987—2017年工业部门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分布动态

注:图中横轴为省际调出比较偏好程度,纵轴为概率密度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分部门层面上,1987—2017年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分布具有如下明显特征:首先,资本密集型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波峰在总体右移的态势下,以2007年为界经历了先右移后左移的变化过程;相反,劳动密集型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波峰在总体左移的态势下,经历了“左移→右移→左移→右移”的变化过程。这表明,资本密集型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整体上升,而劳动密集型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整体下降,体现了资本密集型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整体上升,而劳动密集型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整体下降。其次,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分布的波峰高度总体下降,波峰宽度总体变宽,且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波峰宽度始终小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波峰宽度。这意味着,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的内部差距总体增大,体现了两大部门内部各细分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的绝对差异总体扩大,且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内部差异显著小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内部差异。最后,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的分布均始终存在高度不同的“隆起”。这说明,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均存在明显的极化趋势,即存在异质性群体导致两大部门内部各细分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的绝对差异总体扩大。

五、进一步讨论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综合考虑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而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该战略的提出,对于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重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进而稳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然而,需要警醒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对过去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更不是要淡化甚至放弃国际市场,而是对以往发展战略的扬弃与升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际上是要求从过去瞄准国际市场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转向立足国内市场的主场经济全球化(刘志彪和凌永辉,2020)^[23]。目前,关于如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问题已经受到政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却鲜有研究去量化并分析中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具体表现,及其在不同省份与不同部门间的差异情况。在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基本规律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容易陷入盲目布局的困境,从而导致国家整体战略规划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本文前面的分析结论恰好可以为政策部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特别地,针对中国各省份和工业各部门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存在明显分化的现实(即沿海地区和劳动密集型部门具有强烈的国际经济循环导向,而内陆地区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具有强烈的国内经济循环导向),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发展布局,要立足具体省份与具体部门的现实基础精准施策。

进一步,前文的分析结果还具有如下深刻内涵:一方面,印证了对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理论判断。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迅速发展的过程,但发展质量和水平相对落后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金碚,2018)^[24]。加里·杰里菲和唐纳德·怀曼(1996)^[25]通过分析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制造奇迹”的成因指出,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结构会逐渐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并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为终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部门更加偏好出口,而资本密集型部门更加偏好省际调出的现实,也反映出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仍然较低的现实。另一方面,提供了对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新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一直以来,中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基本没有改变,这种长期分化的局面与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即内陆地区较之沿海地区在增长位势上相对“塌陷”;资本密集型部门较之劳动密集型部门缺乏国际竞争力)是同步存在的。由此可以推断,中国过去固化的经济循环导向模式可能是造成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发展始终面临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权衡,在贸易的地理模式上则体现为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权衡(张少军,2013)^[10]。改革开放之初,落后的经济基础限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这才迫使中国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国际市场。然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等扰乱了全球经贸秩序,严重干扰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对中国过去依托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型赶超模式提出了挑战。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俨然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经济体:一方面,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资源禀赋为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提供了条件,可以支持国内的产业发展(欧阳晓等,2018)^[26];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财富的积累,国内的消费主体、消费结构

和消费规模正经历着深刻变革,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易先忠和欧阳晓,2018)^[27]。这为中国立足国内市场形成专业化分工,进而通过国内省际间的经贸往来释放经济活力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而且,由于一国内部的国内需求是其出口潜力的先决条件(Krugman, 1980)^[6],中国可以走以内需为主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借助省际贸易的繁荣来强化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建设,进而推动出口的增长,更好地释放外贸的经济增长效应。因此,准确把握中国贸易比较偏好的空间特征,厘清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演进规律及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建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且有助于中国更快地实现经济赶超的战略目标。

为此,本文构建了省际调出与出口比较偏好指数,利用中国七年30省份的省际贸易数据,从省份视角和部门视角,全面系统地考察了1987—2017年间中国的贸易比较偏好以及经济循环的内外导向选择,主要的发现有:第一,1987—2017年间,中国各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大于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表明中国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以2007年为“拐点”,各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总体下降,反映了中国的国内经济循环导向总体上在减弱。第二,沿海省份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总体上大于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内陆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始终大于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表明沿海省份的经济循环导向总体上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而内陆省份的经济循环导向则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这反映了中国梯度式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第三,各省份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绝对差异呈现扩大趋势,表明各省份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的绝对差异在扩大。第四,资本密集型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始终大于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劳动密集型部门对出口的比较偏好程度始终大于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表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循环导向则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第五,工业各部门对省际调出的比较偏好程度的绝对差异逐渐扩大,表明工业各部门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导向程度绝对差异逐渐扩大,这反映了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分工程度在不断深化。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要统筹使用好产业政策的选择性与竞争性,加快推进工业结构升级。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国的过程中,产业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过去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导的政策体系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黄群慧,2018)^[28]。因此,在当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仍比较落后的现实背景下,应该尽快调整完善产业政策:一方面,要继续使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来合理引导资源配置,使更多的资源流向资本密集型部门,加快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发展与壮大;另一方面,依据国际市场“竞争中立”的要求(Hormats, 2011)^[29],更多地使用竞争性的产业政策来培育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出口竞争优势。

第二,要尽快完善地区分工布局,合理引导工业部门的市场定位。中国在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立足各省份和各部门的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一方面,各省份要把握好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加快完善其分工布局。特别地,内陆省份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尤其是“一带一路”价值链),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来发展自身经济;而沿海省份则要着重深化国内价值链分工,借助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来重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要结合工业部门的发展规律,合理引导其市场定位。具体地,劳动密集型部门应该更深度地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以充分利用好国内主场优势;而资本密集型部门则应该更深度地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加强对国际市场的开发与利用,进而增强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动态比较优势。

第三,企业要找准方向,妥善处理好内外平衡关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机遇,不同类型的企业一定要结合自身的优劣势,与政策导向进行有效对接。其中,外向型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的外向型企业,在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的基础上,要积极培育国内市场,通过技术改造来进行生产经营重组,进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而内向型企业,特别是资本密集的内向型企业,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下,通过自主创新来提升供给质量与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世界银行. 198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 [2]张少军. 中国的贸易比较偏好[J]. 北京:统计研究,2013,(11):77-83.
- [3]Lin, J. Y., and Y. Wang. Seven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view from the Angl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0, 28, (4):26-50.
- [4]刘伟,蔡志洲. 经济周期与长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和特点(1978—2018)[J]. 北京:经济学动态,2019,(7):20-36.
- [5]朱廷珺,林薛栋. 全球化下的经济赶超路径探索——基于D-S框架[J]. 天津:南开经济研究,2014,(4):32-49.
- [6]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 (5):950-959.
- [7]Costinot, A., D. Donaldson, M. Kyle, and H. Williams. The More We Die, The More We Sell? A Simple Test of the Home-Market Effec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134, (2):843-894.
- [8]Poncet, S.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 (1):1-21.
- [9]行伟波,李善同. 本地偏好、边界效应与市场一体化——基于中国地区间增值税流动数据的实证研究[J]. 北京:经济学(季刊),2009,(4):1455-1474.
- [10]张少军. 贸易的本地偏好之谜:中国悖论与实证分析[J]. 北京:管理世界,2013,(11):39-49.
- [11]Hayakawa, K.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order Effects: The Cases of China and Japa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3:118-126.
- [12]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 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M]. 马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13]Jin, H., Y. Qian, and B. R. Wein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 (9-10):1719-1742.
- [14]彭小兵,韦冬萍. 激活民间社会活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缘起、基础和治理[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35-43.
- [15]Silverman, B. W. *Density Estimation for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M]. New York:Chapman and Hall,1986.
- [16]李善同,齐舒畅,许召元. 2002年中国地区扩展投入产出表:编制与应用[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 [17]李善同,董礼华,何建武. 2012年中国地区扩展投入产出表:编制与应用[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 [18]张少军,刘志彪. 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从全球价值链走向国内价值链[J]. 北京:经济管理,2013,(8):30-40.
- [19]林桂军,黄灿. 出口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了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北京:国际贸易问题,2013,(12):3-14.
- [20]蔡昉,王德文. 比较优势差异、变化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5):41-54,204.
- [21]裴长洪,刘洪愧. 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习近平百年大变局重要论断的思考[J]. 北京:经济研究,2020(5):4-20.
- [22]潘文卿,张伟. 我国工业产品外贸优势变化及入世后的战略选择[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01,(6):52-58.
- [23]刘志彪,凌永辉. 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9.
- [24]金碚.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制度逻辑与治理思维[J]. 北京:经济管理,2018,(6):5-16.
- [25]加里·杰里菲,唐纳德·怀曼. 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M]. 余新天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26]欧阳晓等. 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27]易先忠,欧阳晓. 大国如何出口:国际经验与中国贸易模式回归[J]. 北京:财贸经济,2018,(3):79-94.
- [28]黄群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8,(9):5-23.
- [29]Hormats, R. Ensuring a Sound Basis for Global Competition: Competitive Neutrality[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ial Blog,2011.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Orientation Choice of China's Economic Dual Circulation: Based on the Trade Comparative Bias

DING Xiao-qiang¹, ZHANG Shao-jun¹, LI Shan-to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2.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economic catch-u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is the core goal of every developing count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rapidly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system with its own advantages such as low labor cost. And relying on the export-oriented catch-up model, China has achieved rapid growth of economic scale and the ris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and it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ountries in economic catch-up.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lex sit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has made the foreign trade momentum which used to driv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ecome weak, and China's export-oriented catch-up model that relies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his context, president Xi Jinping makes a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fostering a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architecture with the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stay and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inforcing each other. This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China to achieve its strategic goal of catching u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oriented choice of China's economic cycle in the process of catch-up are still scarce. So,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comparative bia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wo measurement indices (inter-provincial comparative bias index and export comparative bias index) to quantitatively identify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orientation of the economic cycle. And firstly use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s of 30 provinces and 7 years during 1987—2017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reveal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omestic and foreign orientat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nomic cycl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y doing this, it can help to form an accurate judgment on the basic law of China's economic catch-up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architecture with the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stay and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inforcing each other.

By using the new constructed indices, we get the following main findings: (1) At the national level, China's economic cycle is guided by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But with 2007 as the "inflection point",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is substantially weakening, while the ori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is rapidly increasing. (2) The coastal areas' economic cycle is gui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before 2017, while the inland areas' economic cycle is guided by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These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gradient opening-up policy. (3)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to which each province participate in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is widening. This reflec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unctions of each province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4) The capital-intensive sectors' economic cycle is guided by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while the labor-intensive sectors' economic cycle is gui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These reflect the sectoral differences in Chin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5)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to which each sector participate in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is gradually widening. This reflects that the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various industrial sectors is deepening.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three policy inspirations: 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sele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accelera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econ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architecture, China must take differentiate strategies tha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of various provinces and sectors to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reasonably guide the market positioning of industrial sectors. Third, facing the complex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enterprises should find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architectur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trade comparative bia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F14, N70, C14

DOI:10.19616/j.cnki.bmj.2021.2.002

(责任编辑:李先军)